

紅樓夢研究集刊

庚十二輯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Essays and Studies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Twelfth Series
Mar. 1985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625 字数 387,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

统一书号：10186·570 定价：2.95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委 员：	邓绍基	刘世德	陈毓黑
	沈玉成	吴新雷	周绍良
	胡经之	徐恭时	聂石樵
	郭豫适	章培恒	蒋和森
	魏同贤		
顾 问：	孙楷第	吴世昌	吴组缃
	吴晓铃	范 宁	俞平伯
	钱锺书		
常务委员：	邓绍基	刘世德	陈毓黑
	周绍良	蒋和森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邓绍基		
副主编：	陈毓黑	刘世德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刊名题字：钱锺书

封面设计：曹辛之

目 次

曹雪芹和戴震 端木蕻良(1)

读《红楼梦》断想 何满子(9)
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 吴功正(17)
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费秉勋(39)
“木石前盟”、“金玉良缘”与政治的关系 金实秋(65)
关于《红楼梦》中一夫多妻制的探讨 严 望(75)

《红楼梦》中的自我与家庭

——悲剧女主人公林黛玉新探 余国藩(83)
林黛玉性格世界透视 何永康(103)
论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意义 吴 颖(123)

论《红楼梦》形象体系的构成 傅继馥(139)
谈《红楼梦》的肖像描写 陆树仑(159)
艺术的开拓与酒及梦之关系

——谈谈《红楼梦》的生活容量 吕启祥(175)
大观园的艺术价值 曾保泉(187)

《红楼梦》与《醒世姻缘传》 应必诚(203)
贾宝玉与谭绍闻 王浮星(221)
记赵朴初《读石头记》诗 陈邦炎(235)

论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 何林天(237)

- 论郑藏本 李昕 (253)
靖应鵠藏钞本《红楼梦》发现的经过
——兼论靖本批语的特点和重要性 毛国瑶 (267)
靖应鵠藏抄本《红楼梦》批语 毛国瑶 编录 (279)
靖本琐忆及其他 靖宽荣 王惠萍 (293)
- 悼红影议 徐邦达 (303)
文物专家谈陆厚信绘雪芹像 刘东瑞 马志卿 整理 (311)
关于陆厚信绘“雪芹先生”画像的调查报告
..... 河南省博物馆“曹雪芹画像”调查组 (317)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 程德卿 (351)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 郝心佛 (359)
- 新发现的曹颙获罪档案史料考析 张书才 (361)
从若干历史档案看《红楼梦》的历史背景 王宏钩 刘如仲 (387)
- 评《红楼梦》诗词的两种评注 程步奎 (395)
“狱神庙”及“抄没”诸事 周岭 (405)
巧姐寓意试探 杨建文 (413)
“冰山”试析 于芷 (419)
谈《红楼梦》中的植物 陈平 (423)
丰富的植物学知识 陈平 邓双文 (437)
- 报刊文章篇目索引 廖梓 (445)
- 惜春的画 张兰 (38)
“栅栏”与“堆子” 梅尊 (64)
皇八子的病 章兰 (74)

虎丘酒令儿	念世	(102)
人文版的“榧子”注是对的	荷夫	(122)
虎丘自行人	忆费	(138)
首创大观园模型的杨令茀	余楚	(158)
鸭信非鸭舌	文山	(202)
临潼斗宝	费熊	(252)
再说“青儿”与“板儿”	惹草	(266)
《红楼梦》《西江月》词注释辨正	李华年	(278)
与沈京似先生等谈“老蚌怀珠”	石鱼	(292)
秦氏棺板辨	陈平	(302)
《丁郎认父》本事应出于《升仙传》	萧伯青	(316)
一条靖本脂评的校读	杨传容	(358)
《红楼梦》在法国的反响	思彦	(386)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进砌防阶水”小议	林乃初	(394)
《旧雨晨星集》中的“芳卿悼亡诗”	文超	(404)
俞楚江小照和张问陶石刻像	陈亚文	(422)
黄庐隐与《红楼梦》	梅尊	(444)
	易晚晴	(491)
编后记		(489)

曹雪芹和戴震

端木蕻良

曹雪芹和戴震在思想上，有某些相通的事实，早已为人们发现，我这里只想作些补充。

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曾说过：“戴震对程朱哲学这种批判，具有启蒙性质。既和黄宗羲的鲜明的民主政治思想相近，也同《红楼梦》中的某些思想相通。要求解除某些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等级制度，控诉封建礼教、伦理纲常的压制迫害，在某种程度上向往自由，个性解放等……，这些都为曹雪芹的文学巨著和戴震的哲学巨著所共同地憧憬。同时，也正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封建礼教的黑暗、反动和衰败。”

……《红楼梦》中那许多被这个‘理’所压制，所迫害，所扼杀的年轻生命，不正以生动的典型形象证实着戴震的论断吗？曹雪芹以艺术形象的形式控诉封建主义的罪恶，戴震则以哲学理论形式同样喊出了反对以理杀人的正义呼声。”

友人寄给我安徽戴震研究者们写的《戴震传略》里面，也曾有过这样的话：“据段玉裁回忆，戴震写《原善》开始于离家前后，在反动势力迫害下，在阴森恐怖的社会里，戴震没有退缩，而是顽强地、巧妙地向着封建反动势力斗争，这种战斗的性格，正与他同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是共同的。”

我现在试着把曹雪芹和戴震两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来，作个初步的探索。也许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会有些可作参考的地方。

一、他们有着同时代的“机括”

在我国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在同一时代，一位作家、艺术家，以艺术手法创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学家，以逻辑语言组成他正确的理论。当他们把自己创造性的思想揭示给人时，人们发现他们两人的思想却有着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

这个伟大的作家，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义疏证》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儿了，不必多说。因此，我想插入一段旁证，来说明这一点。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也有和曹雪芹类似的遭遇。吴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礼义”这个“神圣法规”的绅士先生们，却忘记了荆楚的祖先泰伯。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则想建造泰伯祠，用来倡导“礼义”。结果，只是给当地封建地主们出了一次大风头（在吴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丑）。随后，泰伯又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至于他“披荆斩棘”的功业，不过为统治者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开辟了通道而已。但在不懂“礼义”的老百姓身上，却能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质朴的“礼仪”来。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

戴震很小就和父亲作过小本生意，因此，接触人的面自然会广泛得多，使他能够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势中，休宁出现了工商繁荣的景象，在雍乾时代又得到更大的发展。瓷、茶、腿三种货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为徽商的主要经营商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画家和文学家。安徽的戏班开始在北京走红，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输送。直到明末清初还有桐城学派牢固的地位和影响呢！

在这里，还须提起一段史实：朱熹这个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刚好是安徽婺源人。戴震则是休宁人。

戴震十岁才会说话，因此，在村塾读书的时间必然较晚，稍长又经常随父作小生意，二十岁后，就靠当塾师自力谋生。可见他的知识学问更多的是靠总结社会，刻苦自学得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微末的教师，敢于站起来反对列为“国学”的程朱理学。这绝不是来自他的天才，而是来自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来自时代付与他的使命。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曹雪芹和戴震两人的行动本身，就描绘出一种共同特色来。他们都敢于公然反对程朱理学，唯有来自普通人的要求和愿望，对他们才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要从决定时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来。

二、“西来法”和“东来法”的交叉点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都曾加以注意。当时的科学，是由一些传教士带来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统的输入。但是，对于这些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戴震却能有意识地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

戴震二十岁便运用西人“龙尾车法”作“羸旋车记”；二十二岁就作“筹算”，整理中国古代九章算法。以后，又写成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可以说，科学实践对他的哲学理论很有影响。

戴震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运用了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近代科学知识的。戴震写过《七经小记》，他想从语言学、天文、数学、社会政治、地理工程、道德伦理、哲学等许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图系统地提出理论。《七经小记》的计划虽未完成，但戴震这种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意图和途径，则是很有意义的。

康熙对于西洋的历法和数学是很重视的，他自己就学代数学。“Algebra”意思是“东来法”，康熙对此常常引以为荣。李煦和曹

家，很长时间经办外洋对皇家的贡品，因此，曹雪芹从小也有机会接触到外来的新奇事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带“机括”的大玻璃镜，自动报时钟，西洋自行船“模型”，千里镜，洋烟，有立体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画像……也都是得自他亲见亲闻的。据赵岗先生统计，曹寅藏书中有关外国史地的，有十八种之多，内有《东鉴》和《华夷议语》两种。曹雪芹很有可能见过这些书。

但是，曹雪芹是文学家。在接触到外洋事物时，敏感的曹雪芹自会从绘画中的西洋透视法，带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钟表上的花纹图案等等，开阔他对新美学的感受，唤起他对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象。宝琴口诵的最后两句：“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我觉得就不太象是写西洋女孩儿的口气，反而象是曹雪芹在抒发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历历，也是要纳入曹雪芹的心灵境界以内呢！

在文学方面，吴世昌从“大荒山”、“无稽崖”这些命名的渊源，指出“曹雪芹有没有从当时的传教士那里得知象《天路历程》或《十日谈》这一类的书，那很难说”。我认为曹雪芹看过新旧《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圣经》中写“马大拉的马利亚”身上有魔鬼附体，但经过耶稣感化，使她纯化了。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这从标榜“兰墅阅过”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原来的造型，是否受到《圣经》上有关马大拉的影响似乎也很值得探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光启时代已有鲜明的结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点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写《石头记》花费了十年心血。戴震在《原善》成书以后，于一七六六年始着笔，用十年时间，写了《绪言》一书，写此书的动机，用戴震自己的话来说，是“发狂打破儒家中太极图”。写成以后，他对此书重新作了增删。一七七七年改定后，易名为《孟子

字义疏证》，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写作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追求的过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积蓄力量，创造最有力的武器。都是以挖封建社会的墙脚作为最终的目的。我们说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费了十年心血，可以说是个“巧合”。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毕生心血，这就不再是什么“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披着“不干朝政”的外衣。《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表面披着“经言”的外衣，骨子里表述自家独特思想。戴震在《疏证》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之。”这不是明白告诉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实思想，须在“经言”的特殊解释中才能得到吗？他怕人们“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庄释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他反对“以神为有天地之本”。戴震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是清醒的。在反对老庄释氏的同时，也反对以理教为代表的儒家。

我们看到，文学家曹雪芹和哲学家戴震两人之间，有这些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会利益的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理解；他们企图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们都可以往上爬的。但是，他们都舍弃了这条路，却有意的向下层接近。虽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们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贵的。也可以说，他们走了他们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难到北京时，作王安国儿子王念孙的教师。在这以前，还作过《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昀家的西席。

王念孙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震在纪昀家可能为时不久，就和纪昀闹翻。纪昀对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纪昀骂戴震是“诽谤洁身之士，助长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曾由纪昀作序。纪昀称敦诚的著作“自成一家”。称赞他的为人说：“其亦人杰也哉！”

敦诚在《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谁编昌谷飘残帙，渐说当年沈亚之”之句。敦敏曾把敦诚的诗抄录一过，敦诚有感于此，写了以上两句诗。

敦诚赞曹雪芹的诗作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樊篱。”可证他自己也是追寻李贺的诗路的。沈亚之的作品有的已经失传，据说他的诗也是“险崛”的一路，这都和曹雪芹的艺术观点有相近的地方。但纪昀对曹雪芹似没有提及，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对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两人对于屈原的评价，同样都是不同凡响的。据俞平伯统计，《红楼梦》引用《离骚》、《楚辞》的词句有八处之多。

朱熹说，屈原为人“不可以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为训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谈到屈原时说：“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对自己作《屈原赋注》的目的，明白说出，是为了使读《楚辞》的人“明其学，观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这也是为屈原思想作辨解，使屈原的真实思想不致受到朱熹的歪曲。这说明戴震看得多么深远透彻。

《红楼梦》写宝玉在《芙蓉诔》里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论点：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亡身。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认为都是“直烈遭厄”。

在这里戴震的“至纯”的观点，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观点汇合为一事。

曹雪芹由于亲闻亲见了许多历史真实，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而执笔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千古至文，从而成为如陈独秀所说的“盖世文豪”。

戴震写《原善》，也是由于“习所见闻，积非我是”，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痼疾而发的。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也是他观察世态的总结。戴震写成《疏证》，自觉“乐不可言，吃饭也别有甘味”。因为他体会到自己使命的完成。曹雪芹则用诗人的笔法写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写书的真正目的所在。他们生存的意义，何等相似！

戴震死后，他的同乡姚鼐骂他说：“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锦庄、戴东原（震），卒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也曾诅咒曹雪芹说：“唯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里说：“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棟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矣。”

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绝嗣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见他俩触动封建社会何等深广，使卫道之士对他俩发出了同样的诅咒声音来！仇者的可笑可怜，只能证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伟大这一历史事实！

他们死后受到如此诅咒，生前当然也不会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议起用戴震和钱大昕负责刊正韵书，都被乾隆驳回。乾隆还下谕禁止戴震讲学。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戴震的友人钱大昕说：“休宁戴震少不善于乡曲”，“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汪中也说，戴震“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里面居然没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辉，正与时俱增。

至于在思想方面，单就“性才一本”这一点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与戴震都是相近的。这里就不作具体分析了。

戴震青年时，曾就学于大商人汪梧风的“不速园”，幼年随父作过小商贩，平生足迹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动，出入于徽州、南京、宁波、扬州、太原、北京一带。他的游踪几乎也有和曹雪芹游踪相比拟的地方。

因此，他们两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观点，和那时代兴起的市民阶层相适应，也是毫不足奇了。

综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虽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时候，却表现出某种相同的思想特征来。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时代空气，有着相应时代振幅。这一点，是值得探讨的。

曹雪芹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他的思想脉络，在向纵深探求的同时，向横阔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正如我们读《十日谈》或《源氏物语》时，如果能探求一些卜伽丘和但丁的关系，紫式部和白居易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作些发掘，就会使卜伽丘和紫式部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北京

读《红楼梦》断想

何满子

艺术作品所提供的认识价值涵藏在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里，应该从作家所写出来的生活场景和暗示出来的意蕴中去寻求。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给出的补充，那作用多半是通过设身处地的体味，以达到更加具体地感受形象的内容；艺术批评家的职能，则是将感受所得作出规律性的阐析，给作品所再现的生活过程的涵义和作者再现生活的艺术风格以符合实际的评价。因此，批评不能背离和越出作品的形象，不该去揣测作家所没有写出来或没有暗示出来的东西。

《红楼梦》描写了贾家由鼎盛发展到衰颓的过程。在曹雪芹所写的现存八十回书里，还没有写出而只是明确地预示了宁、荣两府的破灭。根据作家所提供的，我们有权说，曹雪芹描绘了一个封建大家族在内部的和外部的错综矛盾中走向衰颓的历史及其毁灭的必然性。这个家族的盛极而衰及其终归覆灭的趋势，在封建社会是有典型意义的。它概括了许多封建豪富家族的命运，使读者信服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一个个声势显赫的大家族，都是在恣肆与挣扎、欢笑与眼泪中走完它们的命运之路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有无数钟鸣鼎食的大家族，除了一部分由于战争、突然事变所导致的迅速毁灭以外，在正常情况下，都要经过表现不同但实质无异的《红楼梦》贾家式的实现其命运的过程。曹雪芹通过贾家实现其命运的色彩鲜艳的个性（特殊性），体现了无数封建大家族实现其命运的典型性，并从这个家族生活的史诗般的描绘，透视了这

个社会制度的荒谬性质，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不朽业绩。

但是，家庭只是社会的细胞，个别细胞的萎谢并不意味着整个机体的死亡。因此，许多评论家反复论断过的所谓《红楼梦》概括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之说，无论从《红楼梦》的艺术形象本身和历史事实讲，都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在十月革命的大约八十年前，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预见了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必然性，曹雪芹在 1750 年前后的乾隆盛世，就预示了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这未免太神了一点。莎士比亚写了丹麦王子的复仇和一个淫乱邪恶的王朝的毁灭，并不预示所有封建王朝的终结；巴尔扎克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已是现实时，才能以形象论证封建贵族灭亡的必然规律并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性质。包括曹雪芹在内的、居于时代认识水平顶峰的现实主义大师，艺术思维所拥有的预见性也有一定的限度，以现代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给古人以不虞之誉，也正象说墨子是最早的飞机发明者，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是对历史和古人的厚诬，于事实是不符的。

要预见一种社会制度的毁灭，必须要发见毁灭这一社会制度的力量，于是就得强调某些肯定人物的叛逆性格。在《红楼梦》里，就是贾宝玉、林黛玉，或者再加上晴雯，此外也确实难求了。

贾宝玉当然不是封建家族中循礼守法的孝子顺孙，他反对科举，厌恶八股文，不想做官当“禄蠹”，反对男尊女卑和主奴上下的等级限制，厌烦虚伪无聊的官场应酬，和“金玉良缘”的定命思想抗衡，等等。林黛玉比起和她对照的薛宝钗来，当然不那么端庄温顺，恪守封建道德，她敢于自主地追求爱情，表达对宝玉的爱，她支持或影响宝玉的“偏僻乖张”的思想和行动，最后，她也和宝玉一样地逆“金玉良缘”的定命思想而行，等等。晴雯以一个女奴的身份，反抗思想就更明显，她无视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平等资格和宝玉相